

編後語

1967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迄今半個世紀。首任校長李卓敏對他一手創建的這個機構期許甚殷，並親自出任所長。他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落成記〉中寫道：「中國文化研究所之設，其工作旨趣乃依據中國傳統學術與現代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之學說結合印證，以致力於中國歷史、文學、語言、思想、美術之研究，並探討現代中國及中國與東南亞關係諸問題。本所基址位於大學校園之內，一九七零年杪落成，承學之士舉欣欣然相告曰：中華文化自五嶺以南延一脈于斯地，不亦宜乎。余因之有所感矣。」睽其要旨，不外兩端。其一、中國傳統學術不應抱殘守闕、故步自封，當與現代學問結合，為舊學開創新局；其二、研究所當為守護中華文化、賡續傳統命脈之所在。若將這兩點放置於當時的歷史語境，尤其是國共對峙、文化大革命爆發、傳統文化風雨飄搖之時，後來者當能明白前輩學人的苦心孤詣和高瞻遠矚。事實上，過去五十年，中國文化研究所切實謹守初衷，貢獻己力。為紀念前人開創之功，亦思未來路向，本刊邀請了前任和現任兩位所長陳方正、梁元生撰文，憶述研究所的人和事，並提出前瞻性的建議。

值金禧之年，研究所屬下各中心亦於年內舉辦各項紀念活動。《二十一世紀》歸屬的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於5月12至14日召開「民國人筆下的民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針對近年大量民國時期日記、年譜、回憶錄等新史料面世，探討其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價值和意義。本期「學術論文」欄目優先刊登三篇論文，以饗讀者。張玉法以民國人物的日記、自傳、回憶錄和口述歷史為例，指出這四種史料載體的共通點為自我中心品人論事、隱惡揚善，以及記錄內心世界與私密關係，未宜盡信。唯其與其他史料取長補短，互相參照，有助拼砌歷史真相面貌，自有其價值。楊天石運用《蔣介石日記》和相關史料，論述蔣在台灣時期的思想變化及其「革新」實踐。一方面回歸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另方面向對手共產黨學習，實施各項舉措，將台灣建設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為日後社會發展奠立基礎。黃克武則以顧孟餘為論述對象，勾勒1949至1953年之間在香港發展的「第三勢力」運動的軌迹。然而，這個旨在進行各種反共、反蔣，並大力宣揚自由民主理念的運動，隨着外在形勢丕變和顧孟餘1955年赴美，在國共之間的第三種政治選擇終成夢幻泡影。此外，要向讀者報告，自年初連載的余英時回憶錄將於本期刊完，在此感謝作者信任，授權首發，餘下部分只能俟諸未來。

上個月，一個宣稱自己沒有敵人的人溘然離世。想起他2003年除夕的幾句話：「無權無勢也罷，一貧如洗也好，誰惦記着那些破碎的家庭，哪怕只是默默地為受難者祈禱，誰就是在堅守人性的底線。」看着媒體在他身後的各種評論，驀然一驚，慨歎人性底線之難守。這也難怪，在某些國度，要正直為人確實需要勇氣。可是，除了政治，我們應該還有人性。